

现代作家研究

# 现代作家的 “围城”焦虑 与“突围”叙述

XIANDAI ZUOJIA DE  
WEICHENG JIAOLU YU TUWEI XUSHU

张立新◎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现代作家的“围城” 焦虑与“突围”叙述

张立新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作家的“围城”焦虑与“突围”叙述/张立新著.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307 - 12484 - 4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 -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2026 号

责任编辑:刘延姣 责任校对:郭鸿玲 版式设计:四川科技出版社照排部

---

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印刷: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960 1/16 印张:8.5 字数:146千字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7-12484-4 定价:26.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前 言

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围困”无处不在，除了他人和社会，身体也是牢笼，“人类的灵性被肉体的粗鄙愚昧所拘牵”（但丁），这是人的根性使然。从个体生命的成长来看，从广阔的童年天地步入重重规约下的成人社会，伴随而来的往往是精神世界的逐渐萎缩。傅雷在充满激情地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说，“青年成长的旅途就是一片混沌、暧昧、矛盾、骚乱的历史，顽强的意志，簇新的天才，被更其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性拘囚在樊笼里，它得和社会奋斗，和过去的历史奋斗，更得和人类固有的种种根性奋斗。”在忧世伤生的总体氛围下，现代文学中有代表性的大师们，对于文学之于人生和社会的发现和担当，从不同的方向，对现代人的“围城”处境予以了深刻洞悉和关怀，而“围城”焦虑也可以说是具有社会承担意识和个体生命意识的现代作家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现代主义特有的病症，这不仅指涉社会学意义上的“围城”，也指涉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的人类性的“围城”境遇。本书试图以鲁迅、沈从文、钱钟书这些用文字建构世界、阐发人生的大师为经纬，力图从作品出发，联系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实践，把他们各自放在最能凸现其影像风格的背景上，通过“围城”意识这个辐射点，沟通社会与个人、自我与他者、文学与人生的多重对话空间，探寻现代作家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以及他们在各自历史语境下的人生和艺术的突围。

现代作家的“围城”意识是联结当代文学的一条纽带。“围城”意识的集结、变异和退隐，其实是和“自我”这一个人性话语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个人与时代社会捆绑得更加严密，乃至“自我”和“个人”这样充溢在五四新文学里的核心词汇一度从集体性的政治话语中消失。随着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的来临，金钱代替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了新的话语中

心。因此,现代文学中的“围城”意识与话语突围方式在当代文学中有了新的内涵和表现形态。有过知青作家身份的王安忆说,当年被下放的知青们渴望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返城,以便“把命运变成一次旅行”。知青文学重返青春现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把命运变成一次旅行”的愿望在文学中的实现,在这样一个文学的青春之旅中,知青们的上山下乡就不单纯是集体的命运流放了,而是人生的一次次充满诗意的出发和寻找,是对世界和自我的重新体认,是个人对历史的“诗意”改写。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服从于强大的现实,而是力图超越现实,创造一个任何现实都无法改写的精神世界。站在自我和世界的交叉口上的现代作家,不肯“入围”,想通过纤细的文字,越过笼罩在“自我”四周围墙的限制,拓展出那没有围墙的心灵空间,建立起一份脱离地面重力的精神生活。正是现代作家身陷各种“围城”的焦虑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话语突围方式,使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对于人生的超越,感受到了一份人格精神力量。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节 现代性焦虑下的“围城”意识 .....	1
第二节 “围城”焦虑下的“突围”叙述 .....	7
第一章 鲁迅：“铁屋子”里的孤独者 .....	14
第一节 现代精神“浪子”的先驱 .....	16
一、梦想·现实·梦魇 .....	16
二、知识者的精神形塑 .....	24
三、出走与归来中的故乡与他乡 .....	32
第二节 知识者与大众的博弈 .....	44
一、“闲人们” .....	44
二、启蒙者的悲剧命运 .....	49
三、“同床异梦”的知识者与女性 .....	56
第二章 沈从文：“城”与“乡”——反现代的现代性诉求 .....	63
第一节 文明堡垒外的人性重建 .....	65
一、人与自然 .....	65
二、“乡下人”的自然人性 .....	73
第二节 断裂的新生 .....	80

## 现代作家的“围城”焦虑与“突围”叙述

一、从牧歌到挽歌 .....	80
二、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纠战 .....	86
<b>第三章 钱钟书:知识“贵族”的流亡之旅 .....</b>	<b>99</b>
第一节 知识者的自我寻找与失落 .....	101
第二节 人性的“围城” .....	114
<b>参考文献 .....</b>	<b>127</b>

# 绪 论

## 第一节 现代性焦虑下的“围城”意识

研究文学的人,往往有这样的经验,对任何一个对象的研究,最终都有可能回到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来,如什么是文学,文学的力量在哪里。不回到这些问题,好像就会迷路,就会在一条岔路上越走越远。正是基于对文学本源性的一再质询和追问,我们才一再地回到经典作家和文本那里,回到“厚重”的现代文学去寻找答案。

近代中国在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才猛然惊觉与现代西方世界的巨大落差,就如张爱玲的《中国的日夜》里那个出现在现代化大都市里的道士,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在历史的巨大压力下,在被西方殖民的过程中,感愤于内外多重奴役的知识分子作家,以自己的言说参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诞生之初,现代文学就徘徊在启蒙与救亡、革命与战争、传统与现代、知识者与大众等命题中。杨义认为,现代文学有一个参与历史的传统<sup>[1]</sup>。在忧世伤生的总体氛围下,现代文学承载了太多自身以外的历史重任,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企图给出答案。而对那些有代表性的大师如本书重点论析的鲁迅、沈从文、钱钟书等,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对“历史”重负下的现代人的处境予以深刻的洞悉和关怀。鲁迅那“铁屋子”中孤独的“呐喊”与“彷徨”,沈从文对“边城”人生的诗意书写,张爱玲在“倾国倾城”的世界末日里寻找平凡人生的“传奇”,“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对“围城”人生的戏谑嘲讽。从“铁屋子”“边城”“围城”等这一组

[1] 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20页。

组与作为现代文明产物的“城”这个意象相关的语词来看,现代社会中的围困与突围,似乎已内在地构成了现代文学的无意识,而“围城”这一中心意象则如幽灵,蛰伏在现代作家的意识深层,经钱钟书点题后,更是从无意识的海底浮出了水面。

尼采认为,现代性在本质上是颓废的,“颓废不过是对现代性的意识和对它的接受”,“是人性向着种种理想的攀进,这些理想被认为是不可企及的”<sup>[1]</sup>。在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和压力下,具有社会担当意识和个体生命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在城乡之间、东西之间的往返进退,希望亦或失望,也是在时间和空间、传统与现代之间都无所归依的踟蹰。现代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一方面坚持启蒙主义的历史理性,另一方面又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了对这种历史现代性的深刻质疑。“鲁迅与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不同,他对于‘时间’的问题充满了内心的矛盾,既想前瞻又要后顾,既要为五四的现代性呐喊,又免不了因为对它的怀疑而彷徨。”<sup>[2]</sup>他那经由“立人”而“立国”的理想遭遇到的是“无声的中国”那“铁屋子”般的黑暗死寂,是还没站立起来的奴性十足的喑哑的国民。鲁迅身上颓伤的一面是潜抑的,那是启蒙者对人生和社会那种看不到光明的漫漫黑夜的绝望,是“过客”永在路上的精神苦闷,这些都内在地构成了鲁迅的精神气质。

从个体生命的现实存在来看,“围城”指涉主客体共同作用下的自我和社会的藩篱,既是外部世界有形的牢笼,也是内在无形的枷锁。现代文学几位有代表性的大师从不同的方向捕捉到的,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时代社会的“围城”,在人类文明这个大的历史语境下,“围城”也指涉现代人的存在困境。人类社会追求进步,向往更高级的文明,人类自身也渴求更大的发展。然而,文明本身也是一个极其“野蛮”的过程,身陷文明“城堡”的人们,身心被囚禁于自造的文明之中,如“屏风上的鸟”,飞翔成了一个凝固的姿势,一个永远的梦。因此,在中西的文学表现里,都潮涌着突破文明的“城堡”、返回到未被文明拘役的自然状态的理想诉求。这种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对“文明”的质疑,在现代作家那

[1] 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189页。

[2]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147页。

里,往往体现为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进退,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多重缠绕。沈从文惊恐于“‘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sup>[1]</sup>,强烈感受到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边城”那个生机勃勃的原始生命世界的损毁侵袭,在沈从文眼里,现代给乡村带来的破坏性更大,不但没有文明的教化,连原来的淳朴也丧失殆尽,只添了些虚浮浅薄的时髦。有着末世情结的张爱玲对历史的进化观持根本的怀疑态度,对文明导致的人类毁灭深感无边的恐惧,故而悲悯,故而对历史暴虐下挣扎的世俗男女抱同情宽容的态度。张爱玲的人物都是没有未来的,没有未来的人在这样一个影子般沉没下去的时代里难以立足,只有努力回到过去,在过去的岁月里寻找依靠。学贯中西的钱钟书通过海外归来的方鸿渐的“围城”之旅,也表达了在东西文化碰撞中,在传统与现代都难以立足的文明夹缝中的焦虑意识。

在不同的作家那里,由于个人的经历、性情、学识不同,“围城”的具体内涵也有所偏重和不同。有的更关注社会空间中的“围城”,如鲁迅关注的国民性问题、知识者与大众的关系问题等。有的更侧重于社会时间中的“围城”,重在人世沧桑中人生处境的无法把握。如张爱玲在面对人生须臾这一命定的人生悲剧时,从人生的终点回头寻找人生,带着那浓重的无以救赎的悲凉。在什么都是虚空后,她依然得和她的人物一起兴兴头头地活下去,得为他们生存下去找到足够的支撑和理由,得制造一些小小的传奇,和足以哄骗自己的小小的欢欣。叔本华说,“时间犹如吞没一切的深渊,在它里面一切都消逝得无影无踪;时间具有这样一种魔力:在任何瞬间,我们所掌握的一切东西都会化为虚无,并失去它们所具有的任何真正的价值”<sup>[2]</sup>。在时间的围追堵截中,在死亡这一终极视野的巨大解构力量下,凄惶的生命个体各自为必将逝去的生命寻找暂时的出路,也唯有在这一终极目标的观照下,这个接近死亡的生命历程才显出格外的庄严和悲壮。

“梦”是现代作家敏感的一个词,文学本身就是“实现愿望的梦和表达焦虑的梦”<sup>[3]</sup>。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没有受到意识压抑的无意识的最直接的表现,

[1]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小说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338页。

[2] 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431页。

[3] [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揭开梦乡奥秘的钥匙》,《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395页。

而文学就是作家的白日梦。梦这样一个超现实的存在,更照见了强大的现实世界的不可战胜,日常秩序的牢不可破。鲁迅青年时期曾有着许多关于国家和个人未来的美梦,然而很快在现实面前纷纷破碎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假使寻不到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sup>[1]</sup>。鲁迅把他生活的那个新旧交替的黑暗年代比喻成一个牢笼般的“铁屋子”：“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sup>[2]</sup>鲁迅在新文学初始的《狂人日记》里发出了“铁屋子”里的第一声呐喊,在整个疯狂野蛮的“吃人”历史中,只有精神错乱的现代“狂人”是清醒的,在这个“正常”的社会秩序中,“狂人”只能借“疯”说出“吃人”的真相,现实的压抑机制是如此的严密庞大,以致要说出生活世界的真相需要摧毁正常清醒的神经。“狂人”终归被治愈,不肯被“吃人”社会编码的个人终归屈从于社会的“阉割”,进入了这个正常秩序的社会成为候补去了。

鲁迅虽然对整个社会和人生有着透彻的绝望,但还存有一个对“铁屋子”外光明世界的虚无想象。“狂人”病愈后,作为一个“带菌者”继续“过客”般的人生苦旅,到了三四十年代,有了西方世界的“过客”海外归来,面对残破的家国现实和文明的废墟,身心俱裂,这就有了《围城》里理想破灭后以玩世的面貌出现的“浪子”方鸿渐。从鲁迅到钱钟书,从密不透风的“铁屋子”到层出不穷的“围城”,“铁屋子”的意象也就从时代社会的牢笼扩大成了“围城”这样整个人生的寓言,人的主体精神陷入权利、金钱、身体、人性交织的天罗地网中,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欲望的冲撞与纠葛中,难逃类似卡夫卡的“城堡”那样有形无形的“围城”之困,难逃被自我和社会播弄的命运。

“围城”意识的集结,是和“自我”这一现代性观念密切相关的。追寻自我、发现自我价值是现代文学的重要命题,然而,自我的实现却又离不开社会历史这个大环境,个人无法把自我与世界相割裂,在自我的身上总是投映着“群”的

[1]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59、160页。

[2]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417页。

面影。“认识你自己只是认识他人与人类的同义语。”〔1〕现代中国处于政治、思想文化都很不平静的时代,在向现代化艰难转变过程中,文学有力地参与现实,也参与到了对现代人的发现和建构。然而,文化的裂变,风起云涌的革命和战争,各种意识形态的专制,被“现代”所召唤的个人,淹没在各种纷至沓来的现代性话语之中,无法获取对一个“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主体在现实层面只能成为一个无力的梦游者,“没有任何东西是清楚明白的,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而人只保留了他的洞察力以及对于封闭他的堵堵围城的明确认识”〔2〕。拉康对现代性话语虚构的主体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瓦解,他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经过阉割的,也就是“合理”的。主体不但支配不了现实,无意识的自我也是一个假象,无意识是他人的话语。人不但不能成为自己的无意识的主人,人连自我也不会真正拥有,整个社会网络对于自我是一个异己的存在。“对立与分裂是永恒的,现实世界中已经不存在统一的自我,世界分裂了,自我也分裂了,从此再没有一个花好月圆的良辰美景,没有一个完整和谐的主体了。”〔3〕极端深刻的鲁迅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影的告别》里,“影”就是那个希冀完整的自我,这样的自我在现实的“阉割”下是早已破碎了的,只能像“影”一样成为一种无所附着的精神幻象。“影”无处告别的告别,正是身负重建家国历史重担的知识者遭遇到的个体生命在荒原情境中存在的虚无。

孤独是与“围城”意识相关的一个现代人普遍的生命体验。人生而孤独,但人又害怕孤独,要确认那孤独的个体是世界的一部分,才不为孤独所淹没,才不会感到孤独的恐惧。袁宏道叹曰:“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4〕这是人类典型的心理“围城”。美国精神分析的创始人阿德勒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有群居本能,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有社会实现欲望,个体的生长离不开“群”这个社会大环境。然而,社会这个先于个体的存在往往又成了个体自我实现的障碍。作为社会最终极存在的社会个体与代表历史众数的“群”既相依相存又相互制约,社会往往以集团的力量对个人实行精神的压制,

〔1〕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49页。

〔2〕 [法]加缪著,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5页。

〔3〕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80页。

〔4〕 转引自陈平原:《由文人的人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59页。

从精神上使个体臣服乃至消灭,个人成了面目模糊的一个“点”。在乡下看戏的张爱玲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在中国人的传统人生舞台上打量那被“历史”吸收和消化的无精神个性的个人,这一看,令她非常的惊恐和仓皇:“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sup>[1]</sup>性格孤僻的张爱玲不合群,惧怕与人打交道,哪怕出名后也常常拒绝人的来访。她早在十八岁时写的《天才梦》里,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走不进“群”的生存世界中的孤独和恐慌:“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而“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sup>[2]</sup>。张爱玲执著于“情”的温软的世界,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且处处标明自己是个俗人,喜欢听市声、电车声、人声,用各种世俗的声音和色彩填充自己的寂寞荒凉,在虚张声势的热闹中感受到生命世界的沸腾,仿佛也就暂时摆脱了那要命的孤独,而不至于彻底陷入虚无绝望的深渊。

离群索居、落落寡和是大多数文人的通病,这既铸就了他们艺术上的成就,同时也酿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孤寂和苦闷。作为文学作品的创造者,文字本身就是作家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是作家主体精神与外部世界融合后的内部生命活动形式,往往他们那一份人世情怀又太浓烈了,容易伤身,不得不有所退避,隐逸到情感和精神世界中去。在那个世界里,他的心智、情感、才华才得以施展,而与此相对,现实世界反倒是陌生的、隔膜的。但他们既要独立于“群”的控制和约束,又唯恐与“群”走失,被排斥于“群”之外。正是这种唯恐被时代社会抛弃的无意识恐惧,使得他们不得不时刻在“群”的生活中努力“忘掉”那个孤独的自我,渴望重新回到浩浩荡荡的人群中去,只有人群是安全的,淹没在人群中才能缓解那挥之不去的叫人绝望窒息的孤独。沈从文在“疯”后恢复期间清理深挖自己的病根时,深感“人不能离群,一切由离群而起”<sup>[3]</sup>。然而“人”又是不可亲近的,是要相互撕咬的。钱钟书形容人是刺猬,只能保持彼此距离不

[1] 张爱玲:《华丽缘》,《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257页。

[2] 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7、18页。

[3] 沈从文:《呓语狂言》,《沈从文家书》(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60页。

能亲密无间,否则“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sup>[1]</sup>。这就有了鲁迅的《在酒楼上》的还乡者“我”在独樽独饮中“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sup>[2]</sup>的矛盾心情,有了沈从文在改朝换代的大时代里关于“个人实在太渺小了”<sup>[3]</sup>的反复慨叹,有了孤僻的张爱玲“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sup>[4]</sup>,有了《围城》里方鸿渐那“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清”的“孤岛”意识<sup>[5]</sup>。因此,怎样来保住社会生活中的那一个“人”既不被“群”所抛弃、拒绝,又不被人多势众的“群”所吞噬和淹没,似乎这永远是一对无从解决的矛盾。

## 第二节 “围城”焦虑下的“突围”叙述

叙述是作家以文字建构世界的重要方式,叙述也是“一种被隐藏起来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的无意识对这种话语作出了反应,也就是拉康称之为婴儿在人世上自我认识的镜子阶段的那种反应”<sup>[6]</sup>。本文重点研究的几位作家都以叙述见长,因作家叙述人身份的强烈介入,“围城”意识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了不同的表现形态,也就有了不同的话语突围方式。

作家在面对外部世界时,首先遇到的就是何为现实,作家如何以各自的叙述去把握现实,在个人取景框下的现实,经过了折射、反射、倒影等各种心像技术后,究竟是文本现实还是经验现实,作家与现实或紧或疏的关系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真实”在作法操纵。弗洛伊德以为:“艺术家本来就是背离现实的人,因为他不能满足其与生俱来的本能要求,于是他就在幻想的生活中放纵其情欲和野心勃勃的愿望。但是,他找到了从幻想世界返回现实的途径;借助原来特殊的天赋,他把自己的幻想塑造成一种崭新的现实。而人们又承认这些幻想是合理的,具有反映实际生活的价值。因此,通过某种艺术创作的途径,艺术家实际

[1]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200页。

[2] 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5页。

[3]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27页。

[4] 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37页。

[5]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302页。

[6] [澳]约翰·多克著,吴松江、张天飞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90页。

上就成为自己所渴望成为的英雄、帝王、创造者、受人钟爱的人物,再也不用去走那种实际改变外部世界的迂回小路了。”〔1〕拉康认为,现实不是“事实”,不能像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者一样认为存在一个完整统一的外部世界和能在人的大脑中全面反映的现实,现实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真实地“存在”,而在于它是否能被人们所感知、想象和再现〔2〕。事实上作家和现实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的艺术感觉、创作题材乃至生命意识来源于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作家和现实往往又处于一种紧张背离的状态,然而,又唯有在这种与现实的紧张对峙中,作家才能作出有价值的思考。不同的作家对同样一份现实的认定和取舍往往不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3〕,里面包藏着作家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而同一个作家在前后期对同一份现实或沉入或超脱或亲近或疏离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历史和现实对人内部精神的改写。

作家在各自表现的空间和领域里以不同的方式去切入生活,刺探人生的真相,各自以叙述穿越“现实”的迷雾,去构筑一个更“真实”的世界。那么,何为作家们所追求的“真实”呢?在拉康看来,“所谓真实性的绝对理想是无法实现的。真实性只是幻想所支持的观念,毫无疑问,它只能被理解为现实的鬼脸。在精神分析中,这种真实性就是自我的话语,它是零碎的自我感觉”〔4〕。以此观照,真实就是在现实的镜子中对那个已经破碎了的本心本原的皈依,是对那永远也无法抵达的家园的寻找,而“‘家园’意指这样的处所,只有在这里人们才有‘归根返本’之感”〔5〕。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把真实与现实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和“诗”与“俗”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说,比起历史的真实,诗更为真实,诗提供意义的真实〔6〕。别林斯基认为:“在诗的表现里,生活无论好坏,都同样地美,因为它是真实的,哪里有真实,哪里就有诗。”〔7〕作家的写作直

〔1〕 转引自〔美〕勒内·韦洛克,刘象愚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85页。

〔2〕 参见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238页。

〔3〕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82页。

〔4〕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239页。

〔5〕 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解释》,《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65页。

〔6〕 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52页。

〔7〕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520页。

接面临着“诗”与“俗”的两个截然分裂的世界,或者说是理想之境与现实之境,诗的天地幻境越是广阔美好,现实就越是逼仄。张爱玲因为爱而妥协,而投入万丈红尘。钱钟书因为爱而苛责,而执著于诗的王宫。这看似相互抵牾的两面,实则是互为映照的,往往在俗的世界才能真正发现诗,在对立的一面才能照见自身本然的存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文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桃源情结,哪怕是对现世的批判,也是有着一个理想中的桃源社会为参照的。在红楼梦里,“桃花园以大观园的形态复现了”,然而,大观园也不是长久之地,反倒更为落寞悲凉,大观园短暂孤立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生那无以逃遁的“围城”现实的最好说明。“红楼世界的展开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种生命感觉:人生无从解脱。”〔1〕沈从文对自然和生命有着近乎神性的崇拜,自然在沈从文这里是与文明相对的一个概念,指涉一种与城市文明相对的、少拘束的、自在自由的人生和生命境界。他的湘西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自然田园的桃源,其精神实质上更接近以“情”为重、“情韵并致”的大观园。沈从文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边城”去建构一种逃避现实人生的“诗”的世界,以对乡下“野蛮人”的牧歌氛围和诗意写作来激烈批评“与土地人情断绝了关系”的现代文明人的虚假与轻浮,以对“人类纯真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2〕,重新认定了野蛮与文明,体现出独立的思想价值。“超脱现世和认同现世的人都不需要诗,唯有既不认同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靠诗活着,靠诗来消除世界对人的揶揄,把世界转化为属己的、亲切的形态。”〔3〕

无论是鲁迅的过客心态,还是沈从文“乡下人”的生命哲学;无论是张爱玲的世俗人生,还是钱钟书的戏谑嘲讽,站在自我和世界的交叉口上的现代作家不肯“入围”,不肯被符号化,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想通过纤细的文字,越过笼罩在“自我”四周有形的围墙的限制,拓展出那没有围墙的心灵空间。或者说,正是爱做“白日梦”的作家心中高悬着的理想之灯,照亮了现实中进退失据的“围城”境遇,因此,“围城”焦虑下的现代作家笔下通常采用的是理想和现实的两极叙事模式。如鲁迅的“故乡”系列小说,“记忆”中理想的故乡与现实中萧条的故乡遭遇,童年完整的自然人性与成年后分裂破碎的人格交叉叙事,对故乡寻找的落空,其实也是作者在整个异己的社会中对自己寻找的失落。同样的叙事

〔1〕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262、214页。

〔2〕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45页。

〔3〕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52页。

模式在沈从文那里则表现为城与乡、文明与自然的对立。沈从文刻意以未被现代城市文明染指的蛮荒之地的“边民”身份抗拒城市政治中心文化对一个鲜活自在的个体生命的扼杀和蚕食，潜伏在那个自在自为、任情任性的“水”天地——“边城”背后的，不就是令沈从文忧惧不安的“现代”宰制下的整个庞大的现实中的“围城”吗？张爱玲在战乱的家国现实中深刻地感受到文明毁灭的惘惘威胁和惊恐，她干脆异想天开地借战争的巨手摧毁现实中坚不可破的“围城”世界，砸碎文明的枷锁，在“倾国倾城”后的世界末日的断垣残壁前演绎一段传奇中“地老天荒”的爱情。就是对世事无不嘲讽的钱钟书，在传统与现代都难以立足的《围城》世界里也还安排了唐晓芙那样令人垂涎的在现实中难以找到的理想型人物，特别是赵辛楣，在这个异己的世俗社会里能“为所欲为”，相对的具有行动的能力和自由却不至于被世俗所同化。

文学就是展现历史、现实与真实之间的张力与裂缝。几位大师都对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持犹疑甚至批判的态度，企图为在历史暴虐下的生命个体寻找出路。他们想超越历史，做种种努力，与历史格斗，在时间上逃避，回到过去；空间上逃避，从城市到乡村，从故乡到他乡。然而，无论以怎样的人生姿态、怎样的中心或边缘立场，都难逃历史的规定和选择，劈头遭遇的还是历史，历史无处不在。然而历史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因各自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的不同，有了不同的理解、解释和改编。鲁迅所理解的历史既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也是个人的生活史；既是从个体生命意识的角度去发现人，同时也委以社会的眼光。张爱玲对那崩溃的社会历史中的个人相对抱以同情的态度，因而她的历史是个人的、平民的。在纷乱的世界中，她拒绝进入历史，拒绝被历史修修改改。在她这里，历史不是那记事簿上还散发着血腥气的大事年表，而是群的蠕动，群的匍匐，是他们婆婆妈妈的恩怨纠葛，是那怯怯的小小的愿望和欢喜。那是在“中国的日夜”里的历史，厚实、安稳、热闹，只有这充满了“声色犬马”的日子才是可感可触的，才不是空虚的。沈从文的历史是普通人在自然万物中的日常生活史，他的人物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天地中，他们没有太大的理想，只有现实的生存，然而，在天地万物这个大背景下，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中，一切为生存的挣扎和欢乐都值得敬重、赞赏，而不是用某种现代的观念和眼光去苛责，去悲悯、同情或轻视。“在沈从文超越历史姿态的背后，潜藏着另外一种历史意识。他的叙事所重的，是看似没有意义的微观层面，是处于历史‘意义’裂缝之间的空无所在。